

近30年《药》的主题研究述评*

王志蔚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鲁迅小说《药》发表80多年来,鲁迅研究者对其主题的看法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药》的主题研究先后出现了“批判说”、“疗救说”、“吃人说”、“双重主题说”、“独异个人说”等等。对于这些观点进行历史地、客观地审视,有助于还原鲁迅,并为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奠定基础。

[关键词]鲁迅;《药》主题;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1-127-05

鲁研学者孙郁先生在《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编选后记》中指出:“鲁迅所以倾倒众人,不仅仅是艺术之精深,还有精神之复杂和心灵的超常性”。^[1]数十年来,鲁迅备受争议,概源于此。他的一些作品也是如此。小说《药》从1919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以来,由于鲁迅及其作品的复杂、多意和超常,读者的差异和语境的变迁,人们对其主题思想的认识,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表现了“亲子之爱”,副题旨为“革命者的寂寞和悲哀”;反封建、同情革命、提倡革命是医治民族原始性愚昧的良药是小说的主旨;批判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暴露了封建社会吃人;启示人们起来砸碎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的枷锁,只有“科学”和“民主”才是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良“药”;表层主题是表现群众的愚昧,深层主题则是揭示“老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国民特性;表现“独异个人”唤醒熟睡者的失败和痛苦,等等。本文拟对近30年这一研究的进展进行回顾和考察,以期引起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关注和探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学术界十分活跃,但是鲁迅研究仍然禁锢在极“左”的思潮中,这一时期的许多文章没有实质上的突破。多年来,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成败的历史结论,一直左右着人们对《药》的解读。毛泽东指出,“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旧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2]随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又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3]。延安时期乃至建国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和著作依然发表同样的看法。

可以说,对《药》主题的认识,鲁研界基本上是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参照的。例如有人认为:“鲁迅用‘表现深切’的短篇小说,集中、简练而又深刻地接触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不彻底的,它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4]11}“《药》通过对各种人物的典型塑造和环境描写,给读者这样一个启示:《药》所展现的悲剧从客观上说,是由于反动统治者的思想毒害和造成了人民的麻木和愚昧,但更重要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脱离群众的结果。”^{[4]12}雍容先生认为:“《药》集中描写了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革命者的寂寞和悲哀,是由于群众不理解革命不支持革命的必然结果;而群众的愚昧和落后,恰好表现了辛亥革命没有‘唤起民众’,未能解决‘社会病苦’。所以,《药》的主题就是深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脱离群众的不彻底性。”^[5]长期以来,这种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并被写进大学、中学的教科书。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明确提出:“小栓的下场是个悲剧,夏瑜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悲剧,鲁迅先生既痛心于群众因受封建思想毒害而未能觉醒,更致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脱离群众,这就使小说的结构含有双重的悲剧性。作家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了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只能做‘人血馒头’的材料,甚至连医治痼疾的效果也没有”,^[6]简言之,《药》的主题主要是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脱离群众。作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另一部高等学校教材——《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与唐弢的表述基本相似。特别是李何林先生《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中十五篇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的表述,给了中学语文界很大的影响:“作品……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和愚弄人民的反动本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和群众的

* [收稿日期]2006-10-12

[作者简介]王志蔚(1961-),男,安徽濉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访问学者,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学报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研究方向:鲁迅学。

关系,批判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从一个侧面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启示人们:只有发动群众,革命才能胜利,中国才能得救”。^[7]中学《语文》教材,基本上吸收了上述研究成果。

“批判说”的主要依据是,夏瑜在监狱劝牢头造反,敌友不分,是脱离群众的表现,夏瑜说群众“可怜”,表现了他是居高临下的一个先知先觉者,表明他轻视群众,更脱离群众。小说中,“从贫苦的华老栓夫妇到刑场上的看客、茶馆里的茶客以及亲生的母亲,没有一个人理解和同情夏瑜从事的革命事业,如果他(以及他的同志们)在生前到群众中做了深入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吗?”^[8]这种依据显然是政治话语支配下对鲁迅作品的庸俗解读。

“批判说”形成后,影响很大。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从鲁研界到大中专学校,“批判说”已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一时期重要的论文还有唐元的《不能忘记的历史经验——论〈呐喊〉对辛亥革命的描写》^[9],张一雄的《辛亥革命与鲁迅的小说创作》^[10],张思和的《鲁迅与辛亥革命——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1],邓元煊的《辛亥革命的形象总结——读〈呐喊〉札记之一》^[12],张振声的《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艺术反映——鲁迅小说学习札记》^[13],张宏宇的《鲁迅与辛亥革命》^[14],刘泰隆,冯光廉的《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对关于〈药〉的几点异议》^[8],姜波,张淑健的《华夏悲剧的警醒——〈药〉中几个问题的探讨》^[15]张大为的《鲁迅与辛亥革命》^[16]等。

“批判说”为什么会产生广泛的影响,甚至成为“通说定论”呢?孙郁先生认为,人们“对鲁迅的认同,还仅仅是观念的,或者说是概念性的,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鲁迅遗产便不幸被教条主义化了”。^[17]中国历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确实存在着脱离群众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在后来的革命家看来,正是导致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后,人们往往习惯于迷信权威,盲从权威,自然而然地将上述政治结论泛化运用到评论小说《药》上来,久而久之,“批判说”就为许多人所接受以至公认了。“认为小说《药》批判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的错误,原因之一是由于受革命家‘眼光’的影响。同时也与在鲁迅研究、鲁迅作品中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人为地拔高鲁迅不无关系。不管事实的本来面目如何,似乎只要把鲁迅的革命性说得越彻底,把鲁迅作品的思想性说得越强烈,就越显其尊重鲁迅、维护鲁迅一样。其实恰恰相反,离开客观实际的分析和研究,只能导致歪曲、贬低鲁迅及其作品的价值”。^[18]¹⁶

进入80年代,鲁迅研究者们以消解泛意识形态的勇气,以不同视角反观鲁迅,比较深入地走进鲁迅世界,鲁迅研究有了新的开掘和发现。对“批判说”的批判与重建,就是鲁迅研究中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以笔者所见,魏竞江先生是最早对“批判说”提出质疑的学者。他认为,“批判说”不符合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的实际。^[19]⁹¹《药》“表现的深切”在于:“它并不只限于在广大群众的一般日常生活范围内来揭示长期以来封建专制统治对于他们精神意识的愚弄和毒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在于“从广大群众对于民主革命事实上的迫切需要和思想意识上的全然不觉、甚至不以为然这样一种尖锐矛盾中来突出地揭露这种愚弄和毒害的严重意义……鲁迅写《药》的时候正值‘五四’爆发的前夕,以‘五四’为标

帜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即将迅猛展开。在那激荡人心的伟大时代,鲁迅结合自己以往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的某些感受,根据当时的理解,总结过去的教训,揭示‘病苦’的所在,促使新的革命在战斗中注意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统治加于广大群众身上的精神枷锁,促使人们要着重对于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启蒙发动工作”。^[19]⁹⁴在文章的结尾,魏竞江同志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得出脱离鲁迅的生活实践、创作目的和作品内容的结论呢?“《药》的创作所撷取的素材涉及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某些生活现实,而鲁迅又是曾在《阿Q正传》中对于辛亥革命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的作家。这样一些情况,容易使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于《药》的实际钻研,径自运用有关整个辛亥革命问题的历史定评去对它进行评析”。^[19]⁹⁵魏竞江同志不盲从权威,敢于从鲁迅先生的思想实际、创作目的和作品内容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亮出自己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紧接着很多学者对长期定于一尊的“批判说”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疗救说”。其思想之解放、审视之全面、材料之确凿,阐述之有力,是前所未有的。

从鲁迅的思想上看,在“五四”前后的有关论述中,鲁迅对于工农大众,尤其是对农民大众的看法,落后性看得很多,很重,其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早期是属目于先觉的战士,他既‘排众数’,也不寄希望于工农劳动人民。那时,在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工农劳动人民基本上还没有进入他的政治视野之内”。^[20]“鲁迅当时的指导思想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还不认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从鲁迅的书信、杂感、论文来考察他的思想,他有怒其不争,埋怨群众落后,认为群众脱离革命的认识,在主观上他还没有明确地看到辛亥革命脱离群众这一致命弱点”。^[21]¹⁵³

从时代背景上看,《药》创作的年代正是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的时代,而“科学”和“民主”则是这次运动的两面旗帜。破除迷信,宣传科学,曾经是“五四”时代思想启蒙的举措之一。因为封建制度从来便是和封建迷信落后思想相联系的。1917年、1918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人都曾撰写文章,揭露封建迷信的毒害。鲁迅在1918年至1919年先后写出了《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五十三、六十二等,不断向愚昧无知的旧习俗发起进攻。《药》发表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新青年》上,不可能不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因此,一些学者在否定“批判说”的同时,认为小说“通过革命者夏瑜被封建专制制度所残杀和华小栓因封建迷信而丧命,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歌颂了旧民主主义战士的崇高品德,启示人们起来砸碎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的枷锁,并指出只有‘科学’和‘民主’才是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良‘药’”。^[18]¹⁶李振坤在题为《〈药〉的主题新探》一文中用了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唤醒民众”,惟有“民主”和“科学”才是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良“药”。他指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五四”时期在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斗争中,不仅异常勇敢、坚决,而且把这种斗争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他善于抓住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社会的痼疾而痛加针砭。“鲁迅小说《药》中华老栓和夏瑜这两个人物,正是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这一思潮而塑造的两个深刻鲜明的艺术典型。”鲁迅通过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典型,“深刻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反科学、反民主的黑暗现状,将‘吃人’

的罪恶与淋漓的鲜血展示给广大读者,引导和召唤他们踏上为‘民主’与‘科学’而斗争的道路。鲁迅写小说《药》,恐怕正是为了疗救人民群众所受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的毒害,将他们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这对当时的读者,不能不是一剂切中病害的良‘药’”。^{[18]15}

从创作目的上看,鲁迅在《呐喊·自序》、《咬嚼之余》、《阿Q正传的成因》、《〈自选集〉自序》等文章里对自己的创作意图作了详尽的说明。由此可以看到:一、鲁迅拿起笔从事小说创作,是为了“听将令”,而《呐喊》则是“遵命文学”。二、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们坚信“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22]441}为此,鲁迅在创作小说时有意与前驱者保持同一步调,把斗争的锋芒直指旧社会,“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23]468}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这一时期,除了《药》之外,鲁迅还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风波》、《阿Q正传》等作品,这些作品可谓旧中国灰色人生的真实写照。具体而言,关于《药》创作意图,鲁迅曾对弟子孙伏园这样说过:“《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从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24]可见,鲁迅是遵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命令”而创作《药》的。小说秉持“民主”、“科学”的新理念,正面描写封建主义的愚昧和迷信,夺取了华小栓的生命;侧面描写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主而被封建专制所杀害。既挖出了群众如此愚昧,不觉悟、不理解革命的病根,又表现了革命者孤军奋战,因群众的愚昧而产生的寂寞与悲哀,从而启示人们,要用“民主”与“科学”改造国民精神,疗救孱弱多病的中国社会。从上述角度看,《药》并非致力于批判革命者脱离群众的错误。

从作品的内容看,《药》写了三组矛盾:一是以华老栓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二是革命者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三是革命者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这三组矛盾中,革命者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处于支配、决定的作用,是小说要揭示的主要矛盾。在反映这一主要矛盾时,作品着力描写的是夏瑜和与群众之间的惊人的隔膜,特别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华老栓的愚昧、麻木和落后。此外小说还描写了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的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等愚昧的群众对革命不理解、不以为然甚至敌视,以及夏瑜的母亲对儿子革命行为的茫然等。这既与鲁迅主张用文艺“改造社会”、“改良人生”,进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启蒙思想相契合,又与其前期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明天》、《示众》以及部分杂文反映深受封建思想毒害和专制统治压迫的麻木落后、怯懦自私的受害者形象是一致的。鲁迅一再以刑场上的“看客”、茶馆的“茶客”、酒店的“酒客”来代表愚昧麻木的群众并且将他们当作国民劣根性的重点目标加以暴露、攻打、袭击、批判,其目的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鲁迅对夏瑜是批判脱离群众,还是赞扬他身陷囹圄,不畏孤寂,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不要命”的可贵品格、革命意志和牺牲精神,显然是后者。鲁迅“一方面既批评群众落后、愚昧,对革命不理解,另一方面却又歌颂革命者救国救民,英勇献身的精神。这正是当时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思想特征在文艺创作中的真实表现和反映”。^[25]

从作品的客观效果看,“批判说”的问题在于将主题思想与作品的客观效果混为一谈,把本不属于《药》的内容硬塞进作品里。由于鲁迅忠实地客观地描绘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角,所以读者(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已有较正确认识的读者)在读到它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联系到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的错误。这是作品的客观效果问题,不是《药》的主题思想。况且,即使是作品的客观效果,人们对《药》的认识,也因为读者的阶级、地位、身份、伦理道德的不同而结论迥异。我比较赞同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先生的观点,“鲁迅根据切身的体验和清醒的观察,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把旧民主主义时期群众与革命者关系的悲剧和教训反映出来,客观上发生了这样的启迪和教育作用:要革命,首先必须做好思想发动的工作。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封建,反迷信,把广大群众从封建思想和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否则是不行的,夏瑜的遭遇就是明证。这对于以民主和科学为两大旗帜的‘五四’运动,对于当时的文化思想革命,无疑是起着有力的配合作用、推动作用”。^{[21]148-149}

在学者们否定“批判说”力主“疗救说”的同时,有人提出了“吃人说”。魏泽黎同志在《文学评论丛刊》发表文章指出:“《药》的主题不是批判辛亥革命脱离群众,而是暴露我国封建社会吃人”。^{[26]249}他认为:“小说围绕着这两个家庭描写了三种场所,一种是刑场,是杀人的地方,夏瑜就在那里被杀害了;一种是茶馆,是集中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地方,这种关系就是吃人,华小栓还有华老栓和华大妈就在那里被吃掉了;一种是坟地,是埋人的地方,华小栓和夏瑜就埋在那里,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也埋在那里,所以早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总之这两个家庭、三种场所和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社会里广大人民在苦难和愚昧中灭亡,而革命者又惨遭杀害;生活的道路通向哪里?通向坟墓。这就是《药》的主题,这就是鲁迅写《药》所要‘明确指出’的问题”。^{[26]250-251}谢伟民在《病人吃医生——读〈药〉兼及其主题与描写对象》中也表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狂人日记》表现了“环境吃人(封建家族制度即封建社会制度吃人)”,《孔乙己》表现了“学问吃人(传统文化及旧教育制度吃人)”,《药》表现了“人吃人(病人吃医生)”,《阿Q正传》表现了“自吃(自己吃自己)”,并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主题是一以贯之,并一步步深化的”。^{[27]31}魏泽黎同志敢于挑战权威,用大量的事实材料推翻了“批判说”,具有开创性,其勇气值得肯定。但是,他提出的这一新观点,也让许多学者难以接受。林非先生认为:“说《药》‘暴露封建社会吃人’这是说得过去的,它确实包含有这样的内容,但把它派定为小说的主题思想,却未免太空泛,并不切合实际。有人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出封建社会吃人,这成了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总纲、总主题,这是不无道理的。但问题在于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题材、人物,作者总是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暴露封建社会的弊害。《药》有其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特点、个性,分析作品就是分析它的特点、个性,而不是让特点、个性消融在一般性、共性里”。^{[21]150}接着,林非先生对魏泽黎同志的“吃人说”进一步剖析道:“说华小栓在茶馆里被吃掉了,实在不如说他被封建迷信思想吃掉了来得贴切;说华老栓和华大妈也在那里被吃掉了,则是缺乏根据的论断。由于对作

品的分析,重视场所,而不重视人物关系,涉及人物分析时又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论者所作出的结论……就显得太空泛,也太夸张,由‘通向坟墓’而‘通向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思想也就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了”。^{[21]150}

主题即主题思想,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写什么,即作品内容的主体与核心;二是要表达什么,即作者要告诉读者的基本思想,要说明的主要问题。认真研读《药》可以看到,《药》描写的对象是革命者夏瑜英勇就义的革命壮举,特别是群众的愚昧,鲁迅着力表现群众的愚昧,其目的在于衬托革命者的悲哀。这是作品的主体和核心。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作者对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运用互相衬托的笔法进行描写,把群众的愚昧写得越具体生动,便越衬托出革命者的悲哀。这也说明《药》这篇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不是描写封建社会吃人,而是描写群众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暴露封建社会吃人’只是小说的一个思想内容,是为表现‘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这一中心思想服务的”。魏泽黎同志的观点“混淆了作品思想内容和主题思想的区别,以次代主,偏离了小说的主题”。^{[8]7}应该说这种异议是很有见地的。由于“吃人说”的观点较为空泛、缺乏必要的理论和事实依据,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此说刚一提出,就遭到许多学者的否定,其影响较小。

“八十年代的鲁迅研究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地位非同寻常,一些鲁迅精神的重要命题的开掘,差不多构成于此,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一些热点话题,或是那时的延伸或是一种重复”^{[1]389}正如孙郁先生所说,从90年代至今,虽然一些学者继续《药》的主题探索,但是,总体来看,这种研究相对沉寂,确是80年代研究基础上的一种“延伸”,甚至是“重复”,没有什么重要进展。不过,在这10余年内,《药》的主题研究论文仍然有10余篇,一些论著的有关章节也涉及这一内容。值得注意的有谭桂林的《鲁迅小说启蒙新论》^[28]、尚今的《关于〈药〉的主题的反思》^[29]、牛鹤龄的《也谈小说〈药〉的主题》^[30]、陆伟华《从比较文学角度谈〈药〉的深刻意蕴》^[31]、史冰如的《析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思考——重读〈药〉、〈阿Q正传〉、〈风波〉》^[32]、周健的《试论鲁迅小说〈药〉对辛亥革命的描写》^[33]、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34]、谭德晶的《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35]、罗良平的《鲁迅教学研究》^[36]、杨剑龙的《揭示华夏民族双重的精神悲剧——重读鲁迅的〈药〉》^[37]等等。

应该说,这些论文、论著,能够引起注目的不多,但是一些年轻学者的探索仍令人感到欣喜。谭德晶的《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药》的主题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争论,是因为作品存在双重主题。“这两个主题,一个我们把它叫表层主题,一个则叫它深层主题”。那么《药》的表层主题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历来的文学史、小说史及无数的鲁迅研究的文章著作所说的那个几乎人人皆知的主题。……小说通过老栓一家为了治好儿子的病,竟用沾烈士的血来当作药,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愚昧落后和不觉悟。这样的主题,确实是鲁迅当时的明确诉求,但是在这种明确的表层主题的诉求下,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主题,那就是在小说所反映的世俗的生活画面、人物及其关系之中,揭示出了“老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态,揭示出了“老中国”的国民特性。而对于小说的这一深层次的主题我们历来是没有注意到的”。^{[35]239}

240 谭先生对《药》主题的探索,与上文魏竞江、李振坤、尚今、林非等人的观点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他切入问题的角度却给人以新的启发。

受“铁屋子”意象的启发,美国学者李欧梵先生提出了“独异个人说”。他认为:在《药》里,“独异个人”的主题,是小说内核。小说人物在后台活动的都是“庸众”,而孤独的烈士始终被置于后台。小说的叙述加强了烈士和人民之间隔绝不通的关系的反讽意义。“小说的外在意义是思想必须启蒙,但结论却是悲剧性。这结论就是:个人越是清醒,他的行动和言论越是会受到限制,他也越是不能对庸众施加影响来改变他们的思想”。^{[38]67}“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疏远和失败。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激起自己的痛苦更加深深意识到死亡的即将到来”^{[38]80}。可以说,李先生的认识是对“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解说的一种延伸。作为一位西方鲁迅研究者,李欧梵先生不受国内某些权威的旧说或“定论”的束缚,其见解恰与鲁迅当时的思想和对《药》主题的说明基本吻合。鲁迅从写《狂人日记》一发不可收拾,到整个20年代,对思想启蒙的探索一直处在怀疑,肯定,再怀疑,又进一步肯定的矛盾循环之中。这条启蒙之路“就像一条灰白森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39]《药》没有出现钱玄同所预言的毁坏“铁屋子”的希望,尽管《药》的结尾闪现一点亮色,但那毕竟是“凭空添上去的”的一种世俗的乐观。

纵观近30年来《药》的主题论争,笔者认为,“批判说”失之于简单化、概念化,“吃人说”失之于片面化、表面化。“双重主题说”虽然阐述有创新之处,但是其“深层主题”的内涵,与“疗救说”相较,难出其右。“独异个人说”准确把握了鲁迅启蒙的困境与思想矛盾,主题解说似乎是对鲁迅当年主旨言说的一种复归。“疗救说”在一定程度上契合鲁迅的创作目的,社会环境和作品内容,有许多科学、合理的因素,目前被普遍认可和接受,但是笔者认为其阐释仍然含有一些理想的成分,甚至同样塞进一些作品里实际上没有的东西。鲁迅是复杂的、矛盾的、多意的、丰富的。“他身上隐含着多样性,对立性和不可理喻性精神话题。他的观念可以生成出一系列的‘政治性’话语,也隐含着‘反政治’的纯粹的精神独白。这种多意性,使人们后来对他的解释充满了相悖的思路,结论之不同,话题之反差在中国历代文人中是前无古人的。鲁迅的复杂,使人们很难用一种尺度规范它,任何确切化的语序将其定位时,往往不久就呈现出自身的漏洞。二十世纪的鲁迅研究史,正是一个诸多观念相对对立,相互排斥,且对鲁迅不断误读和不断重读的历史”。^{[17]288}孙郁先生的观点,准确把握了鲁迅研究的历史,切中肯綮,令人信服,用于观照《药》的主题研究历史,也是十分恰切的。鲁迅离开我们整整70年了,鲁迅研究的成果难以尽数,但是当代学人仍然发出“说不尽的鲁迅”的深沉感慨。的确,要真正深入地走进鲁迅,恐怕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我们期待更深入、更令人信服地发现。

[参考文献]

- [1] 孙郁. 编选后记[M]. 汪晖, 钱理群, 等. 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 二,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389.
- [2] 毛泽东. 青年运动的方向[C]. 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63
- [3]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C].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
- [4] 高信. 读鲁迅的《药》[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9).
- [5] 雍容. 《药》的主题、人物、结构及其它[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3):115.
- [6] 唐弢. 中国现代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99-100.
- [7] 语文教材编写组. 语文[Z]. 高中第1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44
- [8] 刘泰隆,冯光廉. 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对关于《药》的几点异议[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4).
- [9] 唐元. 不能忘记的历史经验——论《呐喊》对辛亥革命的描写[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
- [10] 张一雄. 辛亥革命与鲁迅的小说创作[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3).
- [11] 张思和. 鲁迅与辛亥革命——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J]. 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3).
- [12] 邓元焯. 辛亥革命的形象总结——读《呐喊》札记之一[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3).
- [13] 张振声.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艺术反映——鲁迅小说学习札记[J]. 殷都学刊,1981,(2).
- [14] 张宏宇. 鲁迅与辛亥革命[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6).
- [15] 姜波,张淑健. 华夏悲剧的警醒——《药》中几个问题的探讨[J].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4,(4).
- [16] 张大为. 鲁迅与辛亥革命[J]. 乎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4).
- [17] 孙郁, 编选后记[M]. 瞿秋白,等. 红色光环下的鲁迅.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91:
- [18] 李振坤. 《药》的主题新探[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2).
- [19] 魏竞江. 《药》辨[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2).
- [20] 王锦泉. 试评《文化偏至论》[M]. 鲁迅研究:(1). 北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99.
- [21] 林非. 关于《药》的分析与研究[M]. 鲁迅研究: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22] 鲁迅. 呐喊·自序[M]. 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3] 鲁迅.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M]. 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4]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C]. 药[C].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 鲁迅回忆录(专著):上.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7.
- [25] 高长舒. 关于《药》研究的质疑[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46.
- [26] 魏泽黎. 关于《药》[J]. 文学评论丛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6):249.
- [27] 谢伟民. 病人吃医生——读《药》兼及其主题与描写对象[J]. 鲁迅研究月刊,1990:(3):256—257.
- [28] 谭桂林. 鲁迅小说启蒙新论[J]. 鲁迅研究月刊,1999,(1).
- [29] 尚今. 关于《药》的主题的反思[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
- [30] 牛鹤龄. 也谈小说《药》的主题[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 [31] 陆伟华. 从比较文学角度谈《药》的深刻意蕴[J]. 常熟高专学报,2000,(1).
- [32] 史冰如. 析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思考——重读《药》、《阿Q正传》、《风波》[J]. 常州工学院学报,2003,(1).
- [33] 周健. 试论鲁迅小说《药》对辛亥革命的描写[J]. 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4,(3).
- [34] 王富仁.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35] 谭德晶. 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36] 罗良平. 鲁迅教学研究[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
- [37] 杨剑龙. 揭示华夏民族双重的精神悲剧——重读鲁迅的《药》[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4).
- [38] 李欧梵. 铁屋子中的呐喊[M]. 尹慧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80.
- [39] 鲁迅. 仿逝[A]. 鲁迅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朱德东)

Review of the theme research on *Medicine* in recent thirty years

WANG Zhi - wei

(Editorial Office, Journal of Huaibei Polytechnic College, Anhui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over eighty years since Lu Xun published his novel *Medicine*, The Lu Xun researchers have many disputes on its theme. Since the 1970s, the research on the theme *Medicine* has produced "criticism thesis", "treating and saving thesis", "exploiting human beings thesis", "double themes thesis" "isolated individual thesis" and so on. The historic and objective examination on these outlooks is helpful to restoring Lu Xun and continuall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is research.

Keywords: Lu Xun; theme *Medicine*; research; review